

20世纪江西佛教

徐清祥

(江西师范大学 马列部,江西 南昌 330027)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的主流是居士佛教,居士佛教中又以江西的欧阳竟无所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为重镇。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佛教的主流是农禅,其中江西云居山的虚云大师是擎天之柱。

关键词:江西佛教;欧阳竟无;虚云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3)03-0056-05

The 20th Century Buddhism in Jiangxi

XU Qin-xiang

(Marxism-Leninism Teaching Depart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so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Lay-Buddhism was a main aspect of China Buddhism, the China Buddhism College which was founded by Ouyang Jing Wu who came from Jiangxi province was an important place among Lay-Buddhism. In the second so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griculture-Chan was a main aspect of China Buddhism, in which Xu yun who lived in Yun Ju mountain of Jiangxi province was a master of law in a responsible position.

Key words: Buddhism in Jiangxi; Ouyang Jing Wu; Xu yun

佛教是世间的,又是出世间的。从出世间方面说,佛法无漏无为,圆融无碍。从世间方面看,佛教的弘传与功德,都要契机,有地缘也有人缘。本文所谓“江西佛教”,就是从地缘与人缘来立论的。江西是一块与佛教有殊性因缘的红土地。在东晋,江西的庐山因慧远大师的弘传而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晚唐以来,禅宗兴盛于江西境内,其影响是全局性的,历史性的。禅宗一花五叶,都与江西有深厚的渊源。到了20世纪,江西的佛教也有杰出的贡献,其代表一是欧阳竟无的居士佛学,二是虚云大师晚年在江西的振作。当然,净土宗与密宗在20世纪的江西也有出色表现。下面分述之。

一、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教

章太炎说:“自清以来,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①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二:一是清室对佛教僧团实行

压制以及使之与社会相游离的政策,致使僧团对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微弱,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二是僧团内部十分腐化糜烂,不能承担住持佛法的重任。晚清居士长者中,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扬文会。文会门下多豪杰,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赓芸、朗若木、欧阳渐等。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皈依石塘门下的豪杰中,黎端甫是江西丰城人,桂伯华是江西九江人,梅赓芸是江西南昌人,欧阳渐是江西宜黄人。其中欧阳渐为居士佛学中的杰出代表。

欧阳渐(1871-1943),字镜湖,50岁时改字竟元。1906年农历二月,生母汪氏病死,竟无哀恸愈恒,即在母逝日无肉食,绝色欲,杜仕进,归心佛法。次年二月,赴南京金陵刻经处随杨仁山游。1911年农历8月,杨仁山病逝,遵居士遗命,

^①章太炎:《支那内学院缘起》,载于《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未刊)。

收稿日期:2002-09-03

作者简介:徐清祥(1968-),男,江西东乡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列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任编校一职。1914年11月,开始讲学于龚家桥陈氏空屋。听讲者,有姚伯年、吕澂、黄树因、徐克明、苏心田等。一年后在刻经处设佛学研究部。1918年11月,在研究部设支那内学院筹备处。1922年9月,支那内学院正式开学,院址设在南京市半边街。欧阳渐任院长,周少猷主事务,邱晞明主编校,吕澂主教务。1937年冬,率院众息影江津,开始筹建支那内学院江津蜀院。1943年2月23日病逝。竟无于20世纪中国佛教贡献甚伟,下面分述之。

(一)居士佛教的领袖。在中国传统的僧制中,居士是没有地位的,不能开堂说法,坐受供养。住持正法非比丘莫属。竟无反对这些观念,他认为僧俗之分的标准不是出家与否,而是三乘行(声闻、缘觉、菩萨)。行三乘行者,皆是僧类,唯声闻为僧是错误的。《摩诃般若经》、《大智度论》、《维摩经》等经典中,都有在家三乘的记载。居士虽非正僧,但属僧类,可以为师,可以说法,可以阅戒^①。一言以蔽之,居士可以住持佛法。竟无在民国建立之初,在南京与李证刚、邱晞明等组织了一个“中国佛教会”,并得到大总统的支持。他提出一种改革主张,谓僧众业已腐朽,不足应付共和国的新局面,今后佛教徒不分僧俗,能者为上,为佛教开创新局面^②。至支那内学院成立,竟无更是作《释师》为居士佛教正名,并把内院办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居士僧团、居士道场。居士开堂说法,坐受供养,这是20世纪佛教的创举,标志着居士在佛教中地位大大提升了。竟无是近代居士佛教当之无愧的领袖。

(二)对华化佛教的检讨与反省。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600余年的融合,至隋唐已完全中国化,天台、华严、禅、净诸宗已与印度佛法通局殊异:一是丛林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相合,僧团制度与印度有很大不同,这是造成中国佛教腐败的根源;二是心性论上主张性觉,与印度性寂之说有很大不同,由此而修行方法与趋归之路与印度大乘佛教相背,这是造成中国佛教衰微的根源。竟无在僧制上的改革主张上节已述,兹不再叙。在心性方面,竟无认为华化佛教的思想根源是《起信论》。《起信论》是根据魏译《楞伽》的错译而由中国人伪造的。他认为,天台、贤首“率意随情,不顾经论”,“然其词语,处处乖违”。天台三观三止、十界互具的理论,犯了“体性皆用,樊乱淆然”之过。至于禅宗“漫谓佛性不在文字中,于是前圣典籍,先哲之言,废而不用,而佛法真义,寢以微矣”。竟无认为,天台、贤首、禅等认贼作子,“致失佛教原来精意”,这是造成佛法衰微的原因^③。重振佛教必须“复古”,

即恢复龙树无著之学的本来面目。

(三)五科佛学的重镇。竟无自谓:“渐近二十年来研究诸部,得佛法全体之统绪,曰:《般若》《瑜伽》之教,龙树无著之学,罗什玄奘之文。”^④这句话真实地概括了他的学术路向、追求和成就。竟无最初用力的是无著之学,1916年作《百法五蕴论叙》、《世亲摄论叙》、《成实论叙》,提出“相法、唯识非一”的观点,认为五法、三自性是法相宗,八识、二无我是唯识宗,法相宗约缘生理,三科平等,心不独显。唯识宗约缘起理,心识独显。他把法相唯识分为二宗的观点,引起佛学界强烈的反应。章太炎赞同,谓其独步千祀。太虚反对,谓法相必宗唯识。1917年,竟无作《瑜伽师地论叙》,1922年主讲《唯识抉择谈》,这两部著作对法相唯识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佛学界为此激动一时,标志千年绝学已经复兴。唯识学是近代佛学的主流。北京韩镜清的三时学会,与太虚的闽南佛学院都是唯识学的重镇,但较之于欧阳渐无的支那内学院,在人才和学术成就上都不能相及。1923年秋,竟无因儿欧阳东溺死,发愿弘《般若》,学风为之一变。他认为龙树非空宗,无著非有宗,龙树无著“同许之为非空非不空宗”。龙树中观以二谛为先,无著瑜伽以三性为要。二谛说法“克实唯遮俗谛”,三性论教“克实唯论依他起”。二谛之俗即三性依他,二谛之真即三性遍计圆成。“宗不同也,归极于真有。”^⑤1928年,竟无转治《涅槃》、《密严》,思想又有重大发展,至1937年讲晚年定论,提出佛法唯一宗趣是无余涅槃,并把中观、瑜伽、涅槃三学融于一体,至此,竟无完成了他追求纯真佛法之统绪的宏愿。1941年,竟无在江津对自己一生的佛学研究做了总结,他以“顿境渐行”为体系,对俱舍、瑜伽、般若、涅槃四学作了会通提要,于是支那内学院院学大纲卓然而出。他提出顿境(佛境)渐行(菩萨行)是谓教,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是谓教中之法,唯识、唯智、涅槃是谓教中之学。就文字(经典)而论,他讲了四科:初俱舍文字科、次瑜伽文字科、三唯智文字科、四涅槃文字科^⑥。1943年,竟无去世后,吕澂将竟无“四科文字”发展完善为“三周五科”。所谓三周,即选取最重要的佛典五十部,“以三周编制,一周各系一中心思想,而各自成一完备结构。三周又复前后相接,以为一贯”^⑦。第一周,选取十二种佛典,以“心性本净”为主题,此为“知本”。第二周,选取十九种佛典,以“舍染取净”为主题,此为“转依”。第三周,选取十九佛典,以“三界圆净”为主题,此为“终鹄”。三周要义,是以染净问题为主线,对竟无院

① 欧阳渐:《辨方便与僧制》,载《竟无内外学·内学杂著》,金陵刻经处刻本。

② 参见书新:《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中国佛教论集(七)·民国佛教篇》,第8页。

③ 欧阳渐:《唯识抉择谈》,《欧阳渐内外学》。

④ 欧阳渐:《内学杂著·复张君劭》,同上书。

⑤ 欧阳渐:《内学杂著·辨二谛三性》,同上书。

⑥ 欧阳渐:《释教》,同上书。

⑦ 吕澂:《内学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

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所谓五科,就是指每一周中,分立毗昙、瑜伽、般若、涅槃、戒律等五种文字,这是对竟无“四科佛学”的调整。至此,支那内学院院学经过二代人的努力,最终由吕澂完成。院学绝非一院私学,而是对大乘佛学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统绪,千余年所未有,对近代佛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虚云与江西禅宗的振作

1951年,虚云在因“镇反”而演变的云门事件中,受到怀疑、盘查、殴打,身心受到摧残。次年4月离云门北上,中途病于武昌,至9月抵京。虚云在北京做了二件事:一是主坛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二是参与筹组中国佛协。在中国佛协正式成立之后,虚云于53年抵庐山养病,后常住于永修云居山,至59年9月圆寂,未离江西一步。虚云人生的最后十年,是新中国建立的头十年,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变化,佛教面临如何适应新社会的艰巨任务。在这方面,虚云是有贡献的。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智慧,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借鉴与弘扬。

(一)内和与外和并重。如何适应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就是如何处理与世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与世间的关系,是增强佛教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与保证。佛教与世间,不即又不离。不即,是因为出世间。不离,是因为根植于世间。不离世间,在实践中是一种智慧。《杂阿含经》卷二说,佛不坏世间法,佛不异于世间法,佛不与世人争。这些原则归结起来就是“和合”。佛教如何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合呢?虚云认为,首先,在政治上要加强团结学习,发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以尽人民的责任。其次,在经济上要自养而不坐受供养,以维持佛门根本。最后,在思想上要阐发各宗精义,以明佛法真相^①。他说,佛法本来面目“决非一般所想象和指摘的那样卑下”,佛法“于辅翼国策和保障和平,均有裨益,那些诬蔑和谬解佛法的烂言,亦不攻自破”^②。关于“内和”,虚云则从振兴佛教的高度立论。他认为今日佛教的衰败,还是内部不团结的问题比较严重。有一般僧众礼事非人,分门别户,说是论非,更有甚者,不依佛制行持,把清静庄严的佛法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场所。所以,要复兴佛教,出家众应首先团结起来,进一步做到六和合的要求,达到僧团的标准^③。

(二)戒是佛法根本。虚云一生戒行精严,晚年更把戒律提到佛法根本的高度^④。依照我的理解,他的提法有三层含意:一、针对历史积弊。禅宗的创立不仅与否定言教有关,而且与破戒有关。六祖《坛经》说:“心平保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六祖以后,神会的荷泽宗还主张依戒修行,藉教宗通,但这不是主流,主流是江南的洪州宗和石头宗。它们都是破戒和否定言教的。及其末流,辟佛骂祖,既堕魔又堕外。虚云痛切地指出:“佛法之败,败于传戒不如法。若传戒如法,僧尼又能严守戒律,则佛法不致如今之衰败。”^⑤他主张,传戒应恢复印度古制,以五年为期,不能像今天一些寺庙或7天或16天或54天,甚至1天,这样的传戒完全是走形式,是非法的。二、针对当时僧团之混乱。在中国佛协成立会议上,有教徒提出《梵网经》、《四分律》、《百丈清规》害死了许多青年,应当取消。又说大领衣是汉人俗服,不是僧服,应当改革,如其再穿,就是保守封建制度。又说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都应自由,谁也不能管。虚云作《未法僧众之衰相》予以痛斥,认为《梵网》《四分》都是佛老子金口所说,不能改;《百丈清规》一千多年没有异议,应照行^⑥。他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议案《汰除迷信外道渣滓,严戒律清规,以增大众信仰》。他在议案中指出:“今后严行规定僧徒的资格定义,必须出家住院,服装划一,恪守戒律,方许称之为僧尼,方能享受僧尼的权利。”^⑦三、针对当时社会之环境。解放初期,佛教遭受教内外的指责,人民群众对佛教没有正确理解之态度,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虚云认为,只有严格戒律,过高尚的道德生活,才能增强大众的信仰。他说,古人修行,道德高尚,感动天龙鬼神,自然拥护,因为道德是世人最尊贵的。持戒的人,龙天拥护魔外敬畏,破戒的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亦落邪魔外道^⑧。虚云一生重视戒律,认为用功办道首要持戒,戒是无上菩提之本。临终之时,他对身边的弟子说,要保守住这一大衣领,只有一个字:戒。

(三)修行与农业生产相结合。解放前,佛教有庙产,靠田租、花税、募化而生活。解放后,实行宗教自养政策,坐受供养已不可能了。为了衣食住,众人必须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出家人不是俗人,出家的目的就是要修道。田不能一日不作,道也不能一日不修。怎么办呢?唯有把农业生产与修道结合起来。虚云认为修道不一定要静修,修行要在动中修,而且动修比静修更重要^⑨。动用中修行的关键是不为境

① 虚云:《出席中国佛教协会会议感想》,《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订本,修元禅院倡印,1212页。

② 虚云:《新发现的六篇文稿》同上书,122页。

③ 虚云:《佛教徒应该团结起来保卫世界和平》,同上书,117页。

④ 虚云:《戒期开示》同上书,397页。

⑤ 虚云:《乙未四月二十四日开示》,同上书,330页。

⑥ 虚云:《未法僧徒之衰相》,同上书,280页。

⑦ 虚云:《新发现的六篇文稿》,同上书,122页。

⑧ 虚云:《乙未闰三月二十一日开示》,同上书,299页。

⑨ 虚云:《乙未四月一十七日开示》,同上书,325页。

转而能转境,作得了自家的主宰。作得主宰,心能转物则处处是道场,水田里也能办道,秧苗屎尿都是道。作不了主宰,心被物转,则处处是烦恼,事事是是非。明心见性的人,见物更见心,无物心不现。了明心地,动静净秽都是心。虚云大师最后十年大部时间是在江西度过的,他在云居山的宗教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三点理念是佛教与时俱进的产物,在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三、江谦与净土宗

江谦(1875—1942),字易园,号阳复,晚年自号“六字道人”,江西婺源县人。父母都是居士。清光绪28年(1902),江谦辅佐张謇创办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任校长。清宣统二年(1910),江谦被推举为安徽省议员。民国之初,当选为国会议员。1914年,江谦一度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南京积劳成疾,江谦回婺源乡里江湾养病,病中读到清初居士彭绍升《无量寿经起信论》,起信发愿,归命净土,一心念佛而后病迅即痊愈。由此学佛之志益坚,1919年辞去南京高师校长,隐居乡里,专心学佛,相继皈依谛闲、印光二位大师。为了倡导大众修持,他创办了“佛光社”。数年后,佛光社的影响很大,各地净友仿效而设立了不少分社,各省书名人社者达万余人。印光称佛光社为全国莲社之冠。1934年,婺源时有战争,江谦即游化杭州,与居士李锦堂等创设杭州佛光社。1935年,江谦作为婺源佛光社的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佛教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晚年与众莲友在琅山创办“佛儒合一研究班”。1941年,江谦著述《阳复斋丛刊》付梓刊印流通。农历1942年4月初七,江谦在寓所往生。江谦的净土思想很有特色,现分述如下。

(一)融通各宗,归元净土。从历史上看,净土宗的根本经典是《观经》、《阿弥陀经》与《无量寿经》,昙鸾大师即是依此三经,诠释世亲《往生论》。善导大师作此三经的读诵,作为往生净土的行法。诸多祖师的注疏多集中在此三经上,清代居士彭绍升说:“净土三经者,大小《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佛经》是也。此三经者,如鼎三足,不读小本,不入信门;不读大本,不入愿门;不读观经,不能成就三昧门。三经合,而净土资粮备矣。”^①江谦则认为,《华严》《楞严》圆融致密,《法华》《涅槃》开权显实,《圆觉》《金刚》顿教了义,此六经必须修习。学佛应先修念佛三净土经,此六经以为助行,就能

在西方莲法上品而生^②。他说:“愿学唯识人,西方见弥勒。愿修华严人,西方礼毗卢。愿通三藏人,往听弥陀说。愿慕顿脱人,专修净土禅。”^③很显然,他会通唯识、华严、禅宗,而归于净土。

(二)观心不动与转物不为物转。本心不动、转物而不为物转的思想来源于《楞严经》,为禅净二家共推许,江谦于此深信不疑。他在《观心不动偈》云:“造业受轮回,长梦何时醒。皆由念所牵,不与心相应。皆为影所欺,不与镜相应。明心不拒念,拒影非明镜。但观不动心,得见如来性。因念遗念,得佛定方便。念乐苦潜消,念净秽不现。念念阿弥陀,虽念如无念。修慈胜妙门,益以翘勤愿。命终生佛前,自见本来面。”^④关于心能转物不为物转,他说:“要知世万物,皆唯我一心。心外无一物,物外无他心。要将心转物,毋令物转心。娑婆念念灭,极乐念念新。娑婆转极乐,全持此一心。破除我法执,修观二空心。”^⑤

(三)重戒与格物以修身为本。如同虚云大师,江谦以为:“律是佛身。戒行不修,纵定慧功深,皆为魔业。”^⑥这是近代大德总结历史教训而得出的共识。他作《诵戒偈》云:“菩萨戒名一切众生戒,一切众生皆当学也。十重四十八轻戒,菩萨成佛之真因。戒如日月破暗,又如瓔珞珠严身。我是未来当成佛,佛是过去持戒人。佛尚半月半日诵,我当日日又日新。”^⑦依戒修行,是一切众生所必须。其实菩萨戒,是无我戒,要求比小乘有我戒要高。江谦结合儒家修身学说,把念佛与修身、持戒与格物结合起来。他作《格物以修身为本偈》云:“眼耳鼻舌身意,是我六大弟子。……作善作恶随缘,从正从邪都易。不教则易荒嬉,便是长随劫贼。劫我功德法财,窃堕三涂落魄。教则听命真心,便是长随助力。助我三业清静,直到西方净域。……汝眼莫被色盲,汝耳莫为声役。汝鼻当嗅无香,汝舌当味无护。汝身当悟触空,汝意当知法寂。知空即是无常,无常即是苦乡。汝等经当散灭,何不早入道场。同念阿弥陀佛,同礼极乐莲邦。”^⑧

四、密宗二居士

20世纪江西修密宗之居士多矣,其杰出者唯桂伯华、李证刚二人。下面分述之。

桂伯华(1861—1916),名念祖,九江人。早年因父病育,教学乡里。九江名士蔡泽宾先生对伯华十分奖爱,将其女许

① 清·彭绍升:《重刊净土三经示》,《一行居集》。
② 江谦:《阳复斋诗偈集·劝利根念佛人读诵大乘偈》,《阳复斋丛刊》。
③ 江谦:《阳复斋诗偈集·颂华严赞净土》,同上书。
④ 江谦:《阳复斋诗偈集·观心不动》,同上书。
⑤ 江谦:《阳复斋诗偈集·转物不为物转》,同上书。
⑥ 江谦:《安徽佛门龙象传·序》,《阳复斋丛刊》。
⑦ 江谦:《阳复斋诗偈集·诵戒偈》,同上书。
⑧ 江谦:《阳复斋诗偈集·格物以修身为本》,同上书。

配伯华。可惜,蔡女未婚而亡,伯华感其知遇之恩而终身不娶。其节操如是,实为罕见。尔后,伯华恶其僻陋在野,恐堕其志,遂考入经训书院眷移南昌,藉书院膏火而生活。伯华学宗顾亭林,解经主今文家言,诗崇杜苏。因甲午刺激而从梁启超宣传变法,曾主笔沪萃报馆。后变法失败,被划为康党,避祸隐匿乡里,岁暮病虐,痛苦不堪。偶得《金刚经》,中夜晨夕孤灯而读。“恍然于人生虚幻,疾愈,趋金陵,依杨仁山大师学佛”^①,信念至诚至坚。欧阳竟无与伯华是经训书院的同学,二人交谊甚厚,竟无学佛也是伯华导引。竟无说:“伯华为人口吃,顾雄于谈,言语从肺腑出,娓娓动人。教人则孜孜不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惟恐人不知,设多方便。科举时谈佛大忌也,而伯华昌言之,先辈同辈相斥为怪物,不稍动。予时屈从王阳明义,不争辩。但纳于《起信》《楞严》曰:‘姑置床头作引睡书读,如何?’予不觉为牵转也。”^②1907年,竟无寻遗籍东渡日本。伯华此时已在日本学真言宗。二人在东京会面,据竟无说:“若木夫人龚圆常居士,同居日本东京,伯华、奇田圆成及予五人,轮炊分役,终日禁声,人莫哗然。如是年余而散。”^③伯华居日本,与《民报》诸革命家友善,相感以佛化。其革命意志与佛法信念并存。1916年因房中失火,不幸殁于东京。陈铭枢早年在日本从伯华学,后从竟无学。伯华死后,竟无命陈铭枢前去日本吊念。伯华著多毁于火灾,唯存《起信论义记科注》及《遗诗》。

李证刚,字翎灼,临川人。少年就读于南昌经训书院,得皮锡瑞经学之传。20岁从杨仁山学佛,终身布衣茹素。嘉兴沈增植与之结为忘年之交,赠以《大藏经》。1910年,与竟无在宜黄九峰山经营农业。1912年,他与竟无、邱晞明等十位居士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呈请建立中国佛教会。在呈文中,他列居首位。总统很重视他们,面允依法备案。两天后,又给他们一封亲笔函,表示赞同他们的作为。于是,他们便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又创立了一个月刊,由濮一剩主持,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佛教组织。他们提出改革主张,谓当时僧众业已腐朽,不足应付共和国的新局面,今后佛教要不分僧俗,能者为上,为佛教开创新局面。他们用极激烈的口吻,指责出家众无知短见,破见破戒,而引起诸山长老大肆攻击。只是这几位居士非常刚强,尤其是李证刚刚才善辩,他在四方转圜攻之下,三日一会,五日一文,展开攻击,无不正中佛教积弊。可惜后来动了肝火,对人破口大骂,失却社会的尊重与同情^④。据太虚、东初说,李证刚等人欲以居

士佛教取代沙门,引起全国佛教徒的反对。尔后,苏南、浙北的诸山长老把八指头陀搬出来,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全国各寺闻讯纷纷派代表前来参加,并出动有力人士劝说李证刚他们取消独立,解散组织,尊重总会的筹组工作。于是,当寄禅法师在留云寺开会时李证刚等人致函拥护,宣布解散“中国佛教会”。1924年6月,太虚法师主持在庐山大林寺召开的首次国际佛教徒会议,李证刚是出席会议的10余名中国代表之一,代表江西佛教界出席。“九·一八”事变后,李证刚先后任教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在佛学研究方面,他显密兼通,著有《佛家哲学讲义》、《心经·金刚经义门集钞》、《净土五经》、《西藏佛教史略》、《心经密述义》、《佛教显密大义》、《瑜伽寂灭方便义》、《劝发菩提心论》、《佛学书录要略》、《维摩诘所说经集注》等种,深受佛教大德之敬重。

五、20世纪江西佛教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江西佛教影响最大的是欧阳竟无。欧阳竟无有二大贡献:一是系统地反省与检讨了中国化佛教的弊端;二是开创了以恢复印度“纯真”佛学为目的的最大的居士学派。他们对中国佛教的检讨与反省是深刻与痛切的,是佛教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环节,可惜,直到今天,他的观点并未得到沙门的重视与理解,尽管在学界与居士当中影响至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竟无的佛学搞得太纯,容不下不同的东西,与沙门没有和合得好,因而在比丘内部没有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他的门人中,吕澂、熊十力、汤用彤、梁漱溟都是一代大师,蒙文通、陈铭枢、刘衡如、黄忏华、唐君毅、欧阳浚明、姚柏年,也是栋梁之材。竟无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他的贡献彪炳史册。

20世纪下半叶,影响最大的是虚云大师。虚云在20世纪中国佛教史上有二大贡献:一是承继五宗法脉,一花五叶,慧命不绝;二是实现了禅宗在20世纪的转型。当今海内外住持禅门的领袖,多出其门下。如净慧,中国佛协副会长,河北省佛协会长,主编《法音》、《禅》;传印,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现住持于庐山东林寺;一诚,住持云居山真如寺,任中国佛协副会长;佛源,广东佛协副会长,住持南华寺、云门大觉寺;本焕,广东佛协副会长,住持于广州广孝、深圳弘法寺;宣化,弘法于香港,设立美国佛城道场;圣一,住持于香港宝莲禅寺;灵源、唯觉、圣严等弘法于台湾。

20世纪的江西佛教,慧命不绝,薪传未泯。

(责任编辑:余小江)

① 欧阳渐:《竟无诗文集·杜伯华行述》,《欧阳竟无内外学》。

② 欧阳渐:《竟无诗文集·杜伯华行述》,《欧阳竟无内外学》。

③ 欧阳渐:《竟无小品》,同上书。

④ 书新:《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中国佛教论集(七)·民佛教篇》,第8页。台湾